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

INTERPRETATIONS

Reading Cultures and Reception Politic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种瓜得豆

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
与接受政治

张仲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

INTERPRETATIONS

Reading Cultures and Reception Politic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种瓜得豆

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
与接受政治

张仲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 / 张仲民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

ISBN 978-7-5097-9876-8

I. ①种… II. ①张… III. ①阅读-文化研究-中国-近代 IV. G25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830 号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 ·

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

著 者 / 张仲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 薇 邵璐璐 夏仲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75 字 数：349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876-8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的母亲李秀花女士
(1953. 7. 22 ~ 2014. 1. 12)

总 序

“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史学科部分青年教师的研究专著。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是本校最早设置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历史学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许多著名史学家的加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科研实力大为增强。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处于复旦文科发展的前列。

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但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1954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古史教研组（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教研组（主任谭其骧）和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才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形。1958年，中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20世纪70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

经过前辈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已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等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本学科向来重视集体合作与研究，诸如《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都是前辈学者集体合作的结晶。

199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步入21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2004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然而，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中国近代史学科毕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她还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展望未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既要把前辈学者塑造的优良学术传统发扬光大，又要培育学术接班人，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一个学科的发展如同个人的学术研究一样，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贵在薪火传承。为此，我们推出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陆续刊行本领域青年教师的学术专著。此举既是为了展示本学科青年才俊的研究成果，也是借此机会寻求学界先进的批评与指正，以期促进他们学术水平的提高，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先生和其他编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我们在此对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编委会

2013年2月

序

张仲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晚清一批与卫生相关的书籍，在他进行医疗史研究的历程中，经常到中研院，与相关的研究同仁有许多交往。2015年8月我们初次见面时，张仲民告诉我，他即将出版一本新著，并希望我写一短序。如今，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见到他的新著。

我曾经提到过，过去学术界将较多的心力放在全国性的事件，或在全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人物，比较忽略地方的材料与人物。还曾提起过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传播到地方，及其在不同地方呈现的具体样态如何，其实都还不太清楚。张仲民在本书中处理一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人物——舒新城，正是对这个提法的回应。舒新城在五四前后还只是湖南的一位地方型知识分子，正是新文化运动给他提供了出头的机会，让像他一样的地方青年知识分子得以跃至全国性的舞台。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像舒新城一样的地方型知识分子的推动，新文化运动才得以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在这本书中，张仲民处理的另一项课题是“阅读的实践与接受”，这延续了他博士论文以来的探索，这本书中对普罗大众的阅读文化有更细致的展现。我们知道，过往针对学术思想、学科术语和新词汇的研究较为偏重在精英阶层，比较忽略受众的反应。然而，新名词或新概念的铸造虽往往出于精英之手，却是透过各色的大众媒介如报刊、小说、戏曲、教科书等，经由各种管道传播至普罗大众那里才发挥作用。张仲民在本书的第一章梳理了清末启蒙人士希冀从创作新小说、改良戏曲等方面来改造民众之阅读文化，期待下层社会的大众可以成为文明之人的盼望乃是空谈。普罗大众的阅读

文化品味难以改造，清季启蒙人士借新小说和改良戏曲改造民众阅读文化的成效并不如预期所想。

张仲民这本书余下的四章，分别处理的是“淫书”、“黑格尔”、“古腾堡”和“世界语”在近代中国历史情境下的接受史。这让我想起英国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何谓知识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中谈到的，信息要转变成得以使用的知识得历经四个过程。首先是聚集信息，接下来是分析信息，最后则是传播和使用。这四个过程并非次序井然的递嬗过程，而是交互流动的。张仲民指出“淫书”被生产的过程中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禁止“淫辞小说”，另一方面却在制造新的“淫书”。差别只在于这些出自他们之手的“淫书”，是与保国强种、优生学和新式的性文化挂钩的，新“淫书”摇身一变成了社会指导的方针。对于作者跟译者来讲，创作、翻译这些书往往是出于谋利的考虑，未必像书籍广告中所宣称的那样冠冕堂皇。

“黑格尔”和“古腾堡”两章则是着重于这两个文化符号远渡重洋地来到中国后激起的在地因应，以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借之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现实关怀。“古腾堡”一章还特意涉及“四大发明”在近代中国的知识起源，以及有关的历史记忆塑造问题。刘师培和世界语的个别研究，不可胜数，张仲民在“世界语的接受史”一章中以刘师培为中心，旁及章太炎、钱玄同等人的看法，细致地梳理出清末民初的世界语运动，乃是从一项民间的自发性运动，逐渐成为一项政府鼓吹的行动的情况。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现实关怀所在。

张仲民的这本书，使用了许多不常见的报刊、小说、日记等史料，这显示出他搜集史料的细心与勤奋。由于这本书涉及的面向很多，我无法一一介绍其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张仲民特别侧重读者的反应，并且利用相应的史料进行社会史层面的解释，具体展现出其间的复杂和缠结。最近，我在《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一文中提到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无论是晚清的新派或保守派人物在受到时代震荡、西方势力的覆压而无法自持时，总是会不断地

重整、重塑、吸纳或排除各种力量，将中西、古今，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思想结合成一个“复合体”。这些不同程度或是不同性质的想法、理念甚至是行动，都被整合在一起。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丝毫不互相抵触；后世的研究者却因为“后见之明”的影响，而深觉矛盾。张仲民的这本书试着要回到时人那个有机的“复合体”中，我对他的努力抱持肯定的态度。

王汎森

2016年11月于南港

致 谢

从2005年开始写作本书第一章，到现在已经十一年过去了，为此书真可谓“消得人憔悴”了，其间各种经历难以言表，只让我有“凄怆江潭”之感。十余年来花了最大的功夫在此书身上，屡易其稿之后，它却长成这个样子，实在让“黔驴技穷”的我感到惭愧与紧张。然而到了现在拖无可拖的时刻，只能让这本大体围绕读者和受众反应展开的由若干相近主题论文汇聚成的专书问世，同时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歉意，特别是谢意。

在收集资料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有幸得到诸多学者、师长和朋友的指点与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本研究或许就不可能展开，所以在此向他们表达我诚挚的感谢。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姜义华、章清、邹振环、张荣华等教授，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日本成城大学的陈力卫教授，关西大学的沈国威教授，中研院的黄克武、游鑑明、潘光哲、林志宏等教授，四川大学的王东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崔志海、马忠文、刘文楠教授，德国的阿梅龙（Iwo Amelung）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的李孝悌、林学忠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周启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筱才和瞿骏教授，上海社会科学学院的沈洁、潘玮琳、徐佳贵，台湾政治大学的罗皓星、林志晟兄，四川师大的张晓川，山西大学的赵中亚，复旦大学的博士生林秋云、周永生、李稳稳、许静波，东京大学的博士生杨力，湖州师院的鲁卫东教授，等等。

导师之外，这里尤要感谢潘光哲老师，不但要谢谢他十一年以来在学术上对我的指点、帮助与提携，还要感谢他将我这样一个晚学后辈引荐给王汎森先生，使我能够顺利获得王先生愿意写序的允

诺。在此也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厚爱，百忙之中愿意两次抽出时间接待我、指点我，并惠赐大作。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黄海涛（香港城市大学）、陈建守（中研院近代史所）和金菊园（复旦大学古籍所）三位朋友，他们在我过去五六年的研究生涯中，经常扮演审查人的角色，所谓“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未可轻易示人”，他们使我少犯了很多的错误，同时又让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还要感谢上海社科联的周奇兄，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学术“护法”，本书中的不少内容都曾在他所供职的《学术月刊》杂志上发表过，有时因为篇幅过长，甚至需要连载，他也给予支持。

接下来，还要向我所在的学术机构复旦大学历史系及其中的各位同仁表达我的感谢。自2007年7月留系工作以来，不管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生活与工作方面，本人都有幸生活在一个前后多位系领导为青年老师创造的较为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中，并有幸受到多位老师的关照与提携，如张广智、金光耀、黄洋、顾云深、高晞、刘金华、吴景平、熊月之、朱荫贵、戴鞍钢、王立诚、李宏图、巴兆祥、李剑鸣、乐敏、陈雁、郭英之、邓志峰等老师，还经常同一些稍长或同辈的如“欣哥”、“蔚哥”、“奇哥”、“清哥”、“宏哥”、“青姐姐”、孙云龙、章可、曹南屏、仇鹿鸣、戴海斌、司徒、马建标、皇甫秋实等聊天论学，更有热心、善良的王国珍、李春博、陈真伟三位老师以及几位美女老师如于翠艳、李莉、施晴、乔飞、范彦文，包括已经退休或离校的傅德华、吴磊、张丽青、汪丽红、赵芸芸等老师为我们善后。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实在值得珍惜！

再次，要向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各图书馆尤其是郭廷以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资料库”办公室等各个收藏机构致谢，这些地方丰富的馆藏及热情的服务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像我这样的后进即从中深深获益，挖掘到不少有用的资料及

研究信息。

本书在成书过程中，获得过姜义华、乐敏老师领导的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资助，书中部分内容也曾先后在不同的演讲中、会议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这里也要表示感谢。

本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资助和支持，感谢时任历史系主管章清教授、金光耀教授，现任主管黄洋教授、刘金华老师，及先后两位教研室主任王立诚教授、高晞教授，谢谢他们的指导、鼓励和督促，终使得此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我长达三年的拖延中，出版社的徐思彦老师、宋荣欣主任都予以大度的包容和支持，如今终于要问世了，又让各位老师尤其是宋荣欣主任耗费假日审稿，对我反复多次的修正也不厌其烦，这使我感到非常抱歉和感谢，乞请大家可以原谅我的拖延与叨扰。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那已去世将近三年的母亲，每每念及母亲长年累月的辛苦操劳，却于寒冷中突然去世，就忍不住潸然泪下……

自己的每本书，我想都应该附上这样一句“老生常谈”：本书的完成依赖了很多人的指点与帮助，唯书中存在的任何疏失，概由作者本人负责，与其他人无关。

目 录

CONTENTS

序 王汎森 / I

致 谢 / IV

引 言 / 1

第一章 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 / 11

- 一 前现代中国阅读文化管窥 / 15
- 二 改造大众阅读文化之主要举措一 / 26
- 三 改造大众阅读文化之主要举措二 / 34
- 四 检讨 / 46
- 五 小结 / 63

第二章 “淫书”的社会史 / 77

- 一 强种关怀 / 79
- 二 广告宣传 / 82
- 三 著译旨趣 / 93
- 四 译者与作者 / 101
- 五 读者反应之一 / 109
- 六 读者反应之二 / 114
- 七 读者反应之三 / 123
- 八 小结 / 133

第三章 “黑格尔”的接受史 / 137

- 一 “黑格尔”之于中国 / 138
- 二 译介黑格尔 / 141

- 三 哲学译著中的黑格尔 / 150
- 四 援用黑格尔 / 156
- 五 章太炎与黑格尔 / 168
- 六 小结 / 175

第四章 “古腾堡”的接受史 / 183

- 一 古腾堡成为问题 / 184
- 二 再现古腾堡之一 / 187
- 三 再现古腾堡之二 / 206
- 四 再现古腾堡之三 / 218
- 五 中国印刷术与古腾堡 / 232
- 六 接受政治 / 239
- 七 小结 / 245

第五章 世界语的接受史 / 249

- 一 刘师培初倡世界语 / 252
- 二 刘章分歧 / 257
- 三 坐言起行 / 264
- 四 事随境迁 / 274
- 五 小结 / 283

第六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 / 287

- 一 出道 / 290
- 二 福湘女校事件 / 293
- 三 《湖南教育月刊》 / 296
- 四 求助名流 / 303
- 五 其他活动 / 307
- 六 接受及传播 / 310
- 七 小结 / 314

结 语 / 317

参考文献 / 345

引言

甲午以后，学习西方、维新变法逐渐成为晚清朝野大势，经过庚子之役，大家愈加认识到“学战”的意义及取法欧美和东邻日本的重要性，引介和学习来自欧美，尤其是吸收来自日本的新学成为当然之选，“迨经甲午、庚子两大潮流，国中学术思想，概不惜舍己从人，至以儒为诟病”。^①既有此大势，“新”成为崇拜，“今之诸青年，何爱新之甚也，理则尚新理，学则尚新学。欲国之强也，则曰新国；欲民之智也，则曰新民”^②，但由“趋新”造成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在其所滋生的弊病中，来自“译本书、时报纸”中的新名词之泛滥即是其一。^③像时人所指出的，不管是趋新者，还是守旧之人，都在使用这些新名词为自己背书。^④《申报》为此专门发表评论《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批评新名词带来的恶果：

新名词未入之前，中国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词之输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慑、清议不足凭，势必率天下之民尽为作奸之举，而荡检逾闲之行不复自引为可羞……^⑤

① 《论道德心与科学之关系》，《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第2张。

② 敢生：《新旧篇》，《觉民杂志》第4期，甲辰元月廿五日，第7页。

③ 参见《四川学使吴蔚若通敕示谕》，《大公报》1903年2月21日，第4页。

④ 参见《论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5日，第1版；《论今日旧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7日，第1版。

⑤ 汉：《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申报》1906年12月13日，第2版。该文又先后被《东方杂志》与《北洋官报》转载。

稍后，《神州日报》亦发表类似评论，批评新名词成为许多人的护身符，对国民道德造成极大危害：

新名词流行，而人乃悍然以圣贤为不足法，名教为不足畏，清议为不足惧……凡所谓新学新理者，不足为行己求学之助，而适成护身文过之符，不及今救正之，则数十年后必至智育日益进，而德育日益亡。窃科学之作用，以逞诤骗淫恶之行；挟权力之诸言，以为利己损人之具。^①

在当时公开发表的报刊评论中，类似的批评与忧虑颇不乏见。^②仅《大公报》上即刊载多篇评论对此现象进行谴责，其中一篇曰：

吾尝见我中国今日有一种自诩文明者，不过多读几卷新译书籍，熟记许多日本名词，遂乃目空一切、下笔千言，袭西人之旧理论，作一己之新思想，以狡诈为知识之极点，以疏狂为行止之当然，以新学为口头禅，以大言为欺人术，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③

《大公报》上另外一篇评论甚至称当时滥用新名词的人为“学魔”：

兹之所谓魔者，业无根底，格不完全，剽窃一二新名词，居然以输入文明、主持教育为己任，思奏社会上震天动地之伟功。究其所得，大都秕糠糟粕、败絮弃丝，于文化之实际精神，扞格而不相入。以如是之新机形式，不惟难增国民继长之程度，

① 《论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神州日报》1908年7月19日，第1页。

② 关于部分时论对新名词的态度，可参见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第1~42页；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第285~320页。

③ 《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大公报》1903年3月1日，第2页。

亦适以淆国民进化之方针，滥糜学费、虚掷光阴。^①

时尚守旧的上海《申报》则发表评论直斥留日学生无知无学，被革命等激进交换新名词诱惑：

我见今之所谓学生，略语捭皮西提温多的里，即喜新厌故，争思游学东瀛。于是易短衣，去发辫，履声阁阁，趾高气扬。及在彼中留学一二年，乞假归国，则革命流血之毒已深入于心，平权自由之言竟妄腾诸口，薄父母为顽固，视朝廷若仇讎，狼顾鸱张，恣睢夸诞，日惟以排满灭清诸谬说，公然宣布于大庭众之中。及考其所学何如，华文固一无所知，即年来所习之和文，亦只以国脑、国粹、起点、内容、个人、广告、视线、社会、影响、单简、进步、国民、目的、脑筋、学界、商界、舞台、惨剧诸词头填砌满纸，不伦不类，似通非通，叩以彼中之经史百家、兵刑礼乐、天文輿地、化电声光，下逮商贾农桑、百工杂技，不特专门学问无一擅长，即所谓普通者，亦大半茫然不知，瞠目无能对答。^②

一些时人在私下场合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批评。如陈黻宸即批评一些趋新者记住了新名词，却数典忘祖，只能用新名词唬人：

中国学生有休宁人者，告以东原而不知也。若是者谓之不知古，不知古则顽。语必柏林，言称彼得，而问以十八省之风俗民情，不能举其一二者，比比也。若是者谓之不知中，不知中则固。顽固者，彼之所挟为诋人之新名词也。^③

① 《学魔》，《大公报》1903年4月19日，第2页。

② 《说学》，《申报》1904年11月29日。

③ 陈黻宸：《上某尚书第二书》，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374～375页。